

論中共與中國戰略文化間之戰略差異

作者簡介



陳子平上校，政戰學校70年班、政戰學校研究班80年班，國防大學戰爭學院89年班、戰略研究所93年班、政治大學外交系戰略與國際事務研究所碩士；曾任連、營輔導長、新聞官、旅處長、軍團組長、陸軍總部暨國防部政參官、政戰主任、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高級教官，現任職於國防大學。

◆ 提 要

- 一、本文試以「戰略差異」概念，探討「中共」與「中國」戰略文化，兩者間差異何在。
- 二、中共戰略文化絕不等於中國戰略文化，蓋以其戰略文化內涵並非反映實際戰略行為，宣傳殊異於實質（如反制中國威脅論）之故。
- 三、中共自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者，惟其思想淵源深受共產主義影響，實際已與中國歷史文化脫鉤。
- 四、中共強調唯物辯證法與階級鬥爭，雖聲稱防禦為其戰略文化之中心思想；但其對外戰爭特重謀略，採奇襲手段，實充滿暴力與欺騙本質。
- 五、中共戰略文化對軍事戰略之影響，具「先制攻擊」思維，以「跨越式」發展其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軍事變革」，詭譎莫測，深值吾人警惕。

關鍵詞：中共戰略文化、中國戰略文化、戰略差異、軍事戰略

前言

戰略文化研究興起於1970年代美蘇冷戰期間，當時美國戰略社群試圖經戰略思維與文化作連結之途徑，探討蘇聯為主之各國的戰略作為差異，首創「戰略文化」的概念，呈現出嶄新的戰略研究方式。惟中共之戰略文化研究相較於西方起步較晚，近年來對戰略研究始方興未艾。

目前中共企圖將其戰略文化與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戰略文化畫上等號，中共、西方戰略社群與我國的解讀為何？而共軍真正的戰略文化的內涵又為何？這是撰寫本文的動機所在。蓋以當前我們國家安全最大的威脅來自中共，故有必要探究「中共」與「中國」戰略文化間的差異。基此，本文嘗試以「戰略差異」的概念，從各方對戰略文化的研究與發展角度切入，進而研析中共戰略文化對其軍事戰略影響的關連性，由「知己知彼」開始策定「勝兵先勝」必勝之謀。

何謂戰略文化

一、西方戰略文化發展的階段

西方對戰略文化的研究起源於1970年代美蘇冷戰期間，當時美、蘇兩國雖在「相互保證毀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的理性嚇阻下，美國察覺蘇聯仍不斷增加核武數

量，其戰略觀點一直在思考如何使用核武來攻擊敵人；這明顯和美國戰略觀點不同，因為在相互保證毀滅的前提下卻仍思考如何使用核武以攻擊美國，其後果將不堪設想。於是美國戰略社群開始試圖分析美、蘇兩國因為政治、社會、文化內涵的不同，造成戰略的思維、作為、和決策上的差異。特別可從蘭德公司在1977年發布一份由美國學者史奈德（Jack L. Snyder）率先提出的「戰略文化」概念報告看出：「每個國家都有自身的戰略文化，而其核武準則及決策過程均受此戰略文化影響。即使是國家一般的文化特質也會對其領導階層的戰略文化造成重大影響，而國家族群的同質性也會影響到其價值觀的凝聚^①。」

戰略文化研究在西方歷經一系列演變與發展，目前在學界仍然處於探討階段。然而，戰略文化思維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傳統安全政治理論沒有充分考量國家歷史及文化因素的缺陷，就其開拓研究的視角而言，當然具有一定的學術貢獻。

二、中共戰略文化發展的現況

中共對戰略文化研究相較於西方起步較晚。首次使用「戰略文化」一詞的是中共軍事科學院前副院長李際均，他在1997年的〈論戰略文化〉專題，連載在《解放軍報》。將戰略文化定義為：「戰略文化是在一定的歷史和民族

註①：Jack L. Snyder,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s*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1976), p. 9~11.

文化傳統的基礎上所形成的戰略思想和戰略理論，並以這種思想和理論指導戰略行動和影響社會文化與思潮。它具有觀念型態、歷史繼承性、國體與區域特徵等屬性。它是制定現實戰略的潛在意識和歷史文化情結，因為戰略家只能在特定的歷史文化環境和教養中進行認識和實踐創造活動。思想文化與戰略相結合，我們可以稱之為戰略文化。」

其後，《中國軍事科學》刊登了一系列關於戰略文化的論文，除闡述中國戰略文化的內涵外，也對俄羅斯、美國、英國、德國和印度的戰略文化作解析，後來陸續出刊專書。觀察中共戰略社群目前對戰略文化研究的熱衷，無法排除具有政策性的考量，是具有為政治服務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反制中國威脅論，試圖從歷史文化的角度，來論述中國自古以來都不是向外侵略擴張的國家，並強調不會對世界構成威脅。問題關鍵在於，西方和我國戰略社群對中共戰略文化的研究存有程度差異的觀點，「中國」與「中共」的戰略文化，兩者間存有所謂的戰略差異，而且相去甚遠。

三、何謂戰略差異及其影響

本文戰略領域差異的概念，亦係針對戰略文化的研究趨勢作解讀。由於文化本身的定義難以界定，常因為研究角度的不同，連帶使得對戰略文化的描述產生不同的面向，進而得到截然不同的論述，無論是正面或負面的訴求，對

國與國之間，甚至於國際社會都將造成極大的衝擊。正如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會承認本身的戰略文化是攻擊型或具有侵略性的，只會說是迫不得已（如小布希對伊拉克動武等），同時會用道德主義來包裝政策（如邪惡軸心、推廣民主等）。因此，若無法探究一國戰略文化形成的歷史與現實關鍵因素，被其表象論述所誤導而造成錯誤的解讀，將陷於戰略的迷霧而不自知。至於何謂「戰略差異」，簡言之，文化對國家戰略問題縱然具有重要解釋價值，有某些國家由於彼此的認同而可能具有共同的戰略文化，但是其個別宣稱的戰略與其實際的戰略可能是不同的，戰略文化與實際戰略之間不一定存在著因果關係，其真實的戰略文化本質將隨著戰略環境的改變而有所調整，是為戰略差異的概念。

中共建政50餘年來，無論是歷次的軍事衝突、文化大革命造成政治社會的動亂落後，以及在天安門事件中執行血腥鎮壓等，均與中共決策者之戰略文化息息相關。進言之，戰略文化是國家戰略社群成員對於政軍力量使用的心理認知，它的研究是一種強調理念因素作用的研究途徑，以理解特定國家戰略社群成員的戰略作為^②。此外，中共戰略文化的內涵不但具有潛在危險性，更要避免沉迷只看中國的發展潛力，而落入過度浪漫的陷阱之中^③，目前我們國家安全的最大的威脅來自中共，故有必要探究「中共」與「中國」戰略文化的差

註②：莫大華，《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與安全研究》（臺北：時英出版社，2003年3月），頁289。

註③：於下頁。

異所在，不為中共目前對戰略文化渲染之表象所迷惑與誤導，始能保我國家安全。

中國與中共戰略文化的差異

整體而言，中共與西方戰略學者均認為，戰略文化是關於一個民族獨特的有關國家安全問題的戰略思維；但源於不同的思維邏輯和歷史經驗，中共與西方學者對中共戰略文化，卻具有不同的觀感。以下就中國與中共傳統戰略文化的內涵作研析，再以中共、西方與我國戰略社群的觀點，來解析中國與中共戰略文化的差異性。

一、中國傳統戰略文化的內涵

(一) 中國戰略文化傳統淵源

中國傳統戰略文化淵源很早，從周朝到明代，先後有《周易》、《尚書》、《左傳》、《孫子兵法》、《三略》、《六韜》、《鬼谷子》等充滿戰略思想的典籍，而歷史上的兵家、法家、縱橫家等不同的流派，均曾涉及戰略的研討。是以中國歷史上的戰略觀念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天人合一」、「貴和尚中」、「人倫為本」、「崇智重

謀」等基本精神的影響，追求「不戰而勝」、「以戰止戰」、「全勝不鬥」、「上兵伐謀」的境界；在文化上，中國以儒家為主的文化戰略取向著重於防禦性質，萬里長城從來都是防禦的象徵，而不是國界的標誌；概言之，統一、安定、和平始終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軸^④，亦強調「以和為貴」，重文輕武，不主張以武力解決爭端。形成中國傳統文化理念中的世界觀、戰爭觀以及和平觀^⑤。

(二) 世界觀 —— 守勢和平的世界大同

中國儒家文化的道德理想世界，「大同社會」是文化主義天下觀的理論預設與理想歸宿，強調「尊王攘夷」、「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文化天下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建構了中國的和平戰略文化^⑥。從文化形態而論，長達幾千年的中國傳統農耕文化和遊牧民族的生存條件截然不同，農耕文化的特質決定了中華民族不會以狩獵征伐為己任，亦使中華民族不可能在軍事上是「積極有為」的，道家「消極無為」的內向思想成為了中國傳統戰略思維的基本特性^⑦。居安思危是中國安全觀

註③：卡羅拉·麥克吉福特（Carola McGiffert）編，陳孝燮譯，《美國政治印象中的中國》（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5年2月），頁vi-vii。

註④：門洪華，〈中國戰略文化及其重構——一項國際比較的研究議程〉《國情報告》，第12期，2005年3月，頁7。

註⑤：郭樹勇，〈中國的戰略文化傳統〉《國際戰略報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1月），頁520。

註⑥：同上註，頁528。

註⑦：於下頁。

的思想，所謂「故用兵之法，無恃敵之不來，恃無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因此中國的戰略文化傳統亦偏向防禦型，即使是進攻也是在總體防禦前提下後發制人的進攻^⑧。

(三)戰爭觀——慎戰與義戰

在儒家學說中，戰爭的進行要師出有名，須以「禮」為判斷標準；在孟子的論述中戰爭要符合「仁」；墨子的學說中，合法性戰爭被稱為「誅」，與非正義的「攻」相對；所以諸如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都是順天應人的合法戰爭，欲以武力解決爭端就產生慎戰的思想，反對輕啟戰端。其次主張義戰，主張弔民伐罪，爭義而不爭利^⑨；再如，孫子主張：「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主不可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比起西方學者馬基維利的「為求目的不擇手段」與克勞塞維茨的「戰爭是政治的延續」，慎戰與義戰的思想早已蘊存在中國傳統戰略文化之中。

(四)和平觀——道德主義以和為貴

中共學者認為，中國的戰略文化建立在仁、禮、德、和等傳統基礎觀念之上。「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不僅是個人修養的至高境界，同時也是為國家及天下秩序而設計的，這就是所謂「家天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設計。「禮」視天下為同心圓等級結構，以其輻射程度確定等級關係，形成朝貢體系。在「仁」與「禮」體系之下，德化的重要性即凸顯出來，這就是所謂「王道」。德化輔之以「和」，統合道德和文化魅力，穩定的天下秩序也就隨之建立，安全得以保證^⑩。鑒於此，儒家強調「以和為貴」，崇尚和平是中國戰略文化傳統的重要體現，也是化解國際衝突最好的方法^⑪。所以，「仁者無敵於天下」，武力的使用必須以和為貴並符合道德原則的和平觀。

二、中共戰略文化的內涵

上述對中國戰略文化的解說，是目前中共的主流思想；但當今中共對其戰略文化的描述與建構，除了將國家戰略文化與中國傳統戰略文化強行連結外，對中共本身戰略文化的專門研究則付諸

註⑦：程亞文，〈中國近代以來戰略思維的轉變〉，<http://www.gongfa.com/chengyiwzhanluesiwei.htm>

註⑧：張曉軍、許嘉，〈中美戰略文化傳統特徵之比較〉《中國軍事科學》，第17卷2期，2004年2月，頁115。

註⑨：郭樹勇，〈中國的戰略文化傳統〉，前揭書，頁536～537。

註⑩：同註④，頁8～9。

註⑪：俞正梁，〈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國際政治新秩序〉《國際關係理論新視野》（北京：長征出版社，2001年1月），頁316。

闕如¹²。以下就中共戰略文化的淵源、歷史傳統因素的影響、決策者的戰略思想、對外戰爭經驗等四個面向作為基本的思考要素，以分析主導中共建政50餘年來的戰略文化內涵。

(一)中共戰略文化的淵源

中共軍事思想的淵源有三：一為俄共軍事思想的轉用；二為擷取中國歷代兵法及流寇叛亂思想；三為中共武裝鬥爭經驗¹³。以上論述看似具有尖銳的批判性，然以中共本身的記載相對照將覺更為傳神。1929年12月中共召開古田會議決議：「規定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強調對黨員和部隊進行馬克思主義和黨的路線的教育，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¹⁴。」毛澤東還依據馬克思主義關於暴力革命、武裝鬥爭原理，認真分析中國社會實際狀況，指出中國的國情決定了中國革命主要的鬥爭形勢，只能是武裝鬥爭¹⁵。

另一方面，中共黨章也明訂：「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

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行動指南。……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的立國之本¹⁶。」再者，傳統上中共還把「黨的建設、統一戰線、武裝鬥爭」視為戰勝敵人「三大法寶」¹⁷，同時深信「槍桿子出政權」，故追溯中共戰略文化的淵源屬性，不僅無法擺脫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而其暴力本質也是無法改變的。

(二)歷史傳統因素的影響

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認為，一部中國歷史，實際上就是儒家主政史。惟中共信奉馬列主義，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不會接受儒家的傳統，毛澤東在共產政權初期曾親口說：「絕不施仁政」¹⁸。此外，費正清於所編著的《劍橋中國民國史》中「毛澤東思想的勝利」乙節述明：「毛澤東在1949年說，他要建立的新政權正如可以稱之為『人民民主專政』，也可以稱之為『人民民主獨

註¹²：沈明室，〈中共軍事研究的戰略文化途徑〉《解放軍論壇》（龍潭：國防大學戰研中心，2005年2月），頁20。

註¹³：傅仁坤，〈中共軍隊發展及建軍路線之研究〉，政治作戰學校政研所碩士論文，2000年2月，頁1。

註¹⁴：姜思毅，《毛澤東軍事思想論》（北京：中共中央黨校，1994年5月），頁7。

註¹⁵：丁世尤，《毛澤東建軍思想研究》（北京：軍事科學院，1992年月），頁1。

註¹⁶：中國共產黨章程—總綱。<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234229.htm/2005/10/18>

註¹⁷：毛澤東，〈共產黨人發刊詞〉《毛澤東選集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7月），頁539。

註¹⁸：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頁1481。

裁』。是列寧『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和史達林『四個階級聯盟¹⁹』的正統，毛澤東自己也直率承認這一思想上的借鑒，並且特意強調與蘇聯經驗的關係²⁰。」另「毛澤東作為西方化最激進的哲學——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擁護者，在40年代末期開始更加大力地、明確地強調馬克思主義所關注的事項，如需要城市和工人階級的領導，以改造中國社會和文化兩方面的中心作用²¹。」由以上可知，中共本身的歷史傳承，幾乎與中國傳統的歷史文化脫鉤。

再以中共建政以來，將原有社會推向馬列主義的路線運動為例，舉凡三反五反與三大改造運動、大鳴大放與人民公社運動、幹部下放與學習雷鋒運動、文化大革命與紅衛兵運動、批林批孔運動與思想解放運動、六四天安門事件等。中共深恐影響其政權的延續，咸以暴力革命與武裝鎮壓的手段，造成民不聊生、腥風血雨的事實，包含有改造固有文化思想，以打倒所謂封建的資本主義的文化勢力為目的的文化運動；建立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為目的的政治運動，以造成共產黨一黨與當權者的個人

獨裁。凡此皆可證明中共戰略文化並非繼承中國傳統的戰略文化，只是將中國傳統戰略文化作為護身符，實質上執行共產主義政治鬥爭與暴力本質的文化。

(三)決策者的戰略思想

中共以武裝暴動建國，使得中共的黨政決策者完全由軍事領導人轉變而來，集黨、政、軍權力於一身。所以中共決策者的戰略思想，自然形成中共戰略文化的一部分。在毛澤東時代，中共建軍向來不離馬列思想與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是一種封閉式的發展途徑²²。鄧小平上臺後打破教條，強調與世界接軌，建立以中國為核心的宏觀思維。但改革開放是中共前所未有的經驗，故鄧小平的戰略思維對此著墨甚少，倒是於1979年提出四項堅持主張「堅持馬列毛思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一黨專政、堅持共產黨領導」，以維持改革開放的國家政情穩定²³。

2002年十六大報告中，江澤民強調：「適應世界軍事變革的趨勢，實施科技強軍戰略，加強質量建設、實現解放軍現代化的跨越式發展。」2003

註¹⁹：施行專政的人民由四個階級構成：工人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工人是領導，農民是最可靠的同盟軍，小資產階級大多是追隨者，而民族資產階級有雙重性，他們是人民的一部分，同時又是剝削者。

註²⁰：費正清，《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7月），頁981～991。

註²¹：同上註，頁993～994。

註²²：張明睿，《中共國防戰略發展》（臺北：洪葉文化，1998年9月），頁32。

註²³：同上註，頁23。

年江澤民明確提出「我們要積極地推進中國特色的軍事變革。」再於2003年5月胡錦濤主持的政治局集體學習會議中指示：「抓住本世紀頭20年的戰略機遇期，要求國防和軍隊現代化進行跨越式發展²⁴。」共軍決定直接跨進機械化及信息化複合式的軍事變革，據以實踐軍事現代化。事實上，中共的戰略思想在毛澤東時期早已成形，其後雖歷經四代領導人，仍依然未變，正如江澤民所言：「要堅持馬列主義的戰爭觀，毛澤東同志對戰爭全局的經典判斷沒有過時²⁵。」無非以「階級鬥爭」和「唯物辯證法」為理論基礎，堅持以馬列思想為首的共產主義的道路，絕不與西方文化相妥協；因此，馬列主義與中共歷代領導人的戰略思想，也是中共戰略文化的形塑者。

(四)對外戰爭經驗

中共建政50餘年來，在歷次的軍事衝突中，其中除1950年韓戰係擔心美軍於仁川登陸後，美國民主勢力將統一南北韓而介入韓戰外，其他均有關於邊界與領土主權的爭端問題，例如1962年印度政府無視中共警告，侵占

所謂「麥線」以南之中共9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於是發動中印邊界戰爭；又如1979年北越以武力統一越南後，無視中共嚴正聲明，持續騷擾廣西、雲南等中越邊界，中共發動懲越戰爭。此外，中共在南海地區亦有三次用兵：1974年對南越的西沙之戰、1988年對越南的南沙之戰、1995年對菲律賓的美濟礁之戰。

歸納中共對外戰爭的動因，實源於對中國近代史上的悲情與屈辱的反動，因而產生的對「國家安全」的重視及對「領土主權」的特殊情感，形成「政治為先」的「內斂型戰略文化」；中共最在意的是國家安全、領土主權和國家面子的維護²⁶。另外美國學界認為，中共在實際衝突中的作戰特性為奇襲，強調出奇制勝是中共在軍事勝利上的關鍵因素，韓戰就是實例，不僅達到戰略、戰術上「奇襲」的效果，並造成美軍傷亡慘重²⁷。準此，即便是中共強調「防禦」性質的軍事戰略，但面臨領土主權與邊界問題時，絕不排除強襲，並以奇襲方式解決，對敵造成心理震撼，處理南海主權問題便為一例²⁸。所

註²⁴：〈政治局學習軍事新變革，胡錦濤：跨越式發展國防〉，中國新聞網，2003年5月24日，<http://www.chinanews.com.cn/n/2003-05-24/26/306460.html/2005/3/4>。

註²⁵：〈創新與發展有中國特色的軍事戰略理論〉，<http://jcz.sina.com.cn/2003-05-22/127596.html/2005/5/19>。

註²⁶：劉順銘，〈從戰略文化觀點探討中共軍事戰略與用兵動因〉，國防大學國防管理學院國防決策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6月，頁164～165。

註²⁷：Mark Burles and Abram N. Shulsiy，吳惠民等譯，《中共動武方式》（臺北：國防部史編局，1990年3月），頁7～8。

註²⁸：於下頁。

以，中共對外戰爭的經驗教訓絕非所謂的「積極防禦」，尤以其現代的軍事戰略在綜合國力大幅提升後，共軍思維顯得比以往更為積極，是以主動的，甚至是進攻性的部署和行動，來達到保衛自己的目的²⁹。

三、中國與中共戰略文化之差異

由於對戰略文化的研究，由主、客觀的觀點與角度切入將得到不同的結果，中國與中共戰略文化是否相同，兩者間是否存有相當的差異，中共、西方以及我國的戰略社群都各有不同的觀點，茲分述如后。

(一) 中共戰略研究社群的觀點

中共學者對戰略文化的解讀與西方學者明顯不同，基本上以宏觀視角的剖析為其主要研究特色。認為傳統思想是戰略文化的根源，從傳統文化思想的角度研究戰略文化已成為主流，相關論述摘錄於后：

李際均、門洪華：「強調文化概念宏觀層面的含義，將文化界定為系統化的思想和理論，因而將戰略文化研究等同於戰略思想、戰略理論研究，並以這種思想和理論指導戰略行動，影響社

會文化與思潮³⁰。」

秦亞青：「戰略文化指一整套宏觀戰略觀念，基本上為國家決策者所認同，將建立起一個國家長期的戰略取向。從1985年鄧小平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兩大問題後，就從以強調鬥爭為核心的戰略觀念轉變為以合作為核心的戰略觀念³¹。」

宮玉振：「戰略文化傳統具有歷史延續性、文明關聯性、價值觀念主導性等特點。隨著90年代中國的崛起，西方對中國未來的戰略走向日益重視，並提出中國的崛起必然導致對外擴張，必然對世界構成威脅的結論³²。」

程亞文：「近代以來中國戰略思維經歷了由『文化至上』到『國家利益至上』再到『國家利益及地區責任』的二次思維模式轉換。決策者戰略思維，必須認真地考察當代中國的文化形態和面對的國際戰略環境³³。」

周丕啟：「戰略文化是戰略決策者思維和行為習慣，加強對戰略文化的研究必然有助於拓展和深化對戰略問題的研究，戰略文化對戰略選擇具有重要

註²⁸：潘進章，〈中共戰略文化之探究〉《國家安全與軍事戰略研究》（龍潭：國防大學軍事學院，2004年9月），頁70。

註²⁹：同註²⁶。

註³⁰：同註⁴，頁6；李際均，〈論戰略〉，前揭書，頁9。

註³¹：秦亞青，〈國家身分、戰略文化和安全利益〉《中國外交》，第8期，2003年1月，頁8～9。

註³²：宮玉振，〈戰略文化傳統及其對戰略行為的影響〉，<http://www.3luem.com/lswlInfo.asp?id=122005/5/11>

註³³：同註⁷。

影響作用³⁴。」

以上論述，只見中共學者以文化及戰略名詞包裝的戰略文化，絲毫未見馬列思想及共產主義的身影，值得關注。

(二)西方戰略研究社群的觀點

西方學界對於中共戰略文化之戰略本質，企圖予以適切的定位，藉以發現或證明中共在軍事戰略上是否屬於防衛的戰略文化、攻擊的戰略文化，或者是辯證二元論（攻防兼備）戰略文化。相關論述摘錄如后：

費正清（John K. Fairbank）認為：「中國的決策者向來重視地面防禦性的戰爭，與歐洲擴張性攻擊主義理論完全不同。」美國中國問題專家蘭普頓（David M. Lampton）認為：「中國是全球化的參與者，中國在經濟與軍事實力，甚至思想文化觀念都在增強，中國的政策走向傾向於使用感召、利誘手段而不是威逼³⁵。」

江憶恩在其著作中即詳列西方學者認為中共戰略文化是否屬於備戰，攻

擊型的國家。其中強調：「中國戰略文化中攻擊型現實主義的核心，在毛澤東以後並無變更，仍然主導著中國的戰略選擇和戰略行為³⁶。」

美國陸軍戰院史柯貝爾博士（Andrew Scobell）則認為：「中共的戰略文化極難界定為愛好和平或好戰，其戰略文化應該是同時包含愛好和平與好戰兩種特性，前者來自中國的孔孟思想，使其戰略文化以避免衝突、防守為主；而後者受到權力政治與政治現實的影響，強調軍事解決與攻擊導向，這兩種思維辯證同時共存，形成『防禦崇拜』（Cult of Defense）的戰略文化。但是基於國家統一及採取『積極防禦』戰略，仍會採先發制人而使用武力³⁷。」史氏不僅觀察到中國文化中「王道」與「霸道」的辯證存在；又能釐清中共戰略決策者用兵的本質，包括以攻擊和先制攻擊作為後發先制與積極防禦的戰略本質。

(三)我國戰略研究社群的觀點

前國防部副部長林中斌早在

註³⁴：周丕啟，〈論戰略文化〉《現代國際關係》，第10期，2001年10月，頁56～60。

註³⁵：David M. Lampton, "China's Growing Power and Influence in Asia: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http://www.nixoncenter.org/Program%20Briefs/PB%202004/LamptonUSCCTestimony2-13-04.pdf>/2005/5/16

註³⁶：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and Strategy in Maoist China." in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ed. Peter J. Katzenstei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16～268.

註³⁷：Andrew Scobell, *China and Strategic Culture*, Report of SSI (Carlisl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War College, pp.4～21, <http://www.carlisle.army.mil/ssi/pdffiles/PUB60.pdf>/2005/5/16

1988年於《核霸》一書中將中共的核武戰略放在中國戰略傳統的歷史流變中進行考察，而中國傳統戰略理論的特徵為：「人的因素第一、防禦第一、詭計第一」，由此引伸中共戰略的歷史根源在於重視「非軍事和非戰鬥的因素」；「二元性相結合」，「變化和流動性」；「否定論與極小原則³⁸。」

翁明賢認為：「中共的核武戰略是與中國戰略傳統文化相結合，反之，研究中共軍事，不能忽略傳統戰略文化的影響力³⁹」。

莫大華在〈中共戰略文化初探〉一文中強調：「中共戰略文化深受中國傳統戰略思想的影響，從人為根本、防禦為先、欺敵為先的傳統戰略思考；但中共戰略文化卻是務實型戰略文化，其特質包括人民戰爭的戰略思想、積極防禦的軍事準則、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⁴⁰、黨國式的文武關係、欺敵的心理謀略戰等⁴¹。」

綜合上述，中共戰略社群雖然一再論述其戰略文化是繼承中國傳統的戰

略文化；但西方與我國戰略社群卻有不同的觀點。事實上，中共戰略文化具有不同的面向，不輕易被外界洞悉其內涵所在，其特點將防禦與攻擊的戰略文化相整合，隨著戰略環境的改變作調整，屬於較具有彈性的務實型戰略文化。

中共戰略文化對其 軍事戰略之影響

中共基於戰略文化對於國家安全觀的潛在影響，其軍事戰略也隨之有不同的內涵。自1949年建政以來，共軍的軍事戰略係由毛澤東提出「人民戰爭」概念以及「積極防禦」的基本戰略來主導軍隊；惟「人民戰爭」的運用，其局限性在韓戰初期已暴露無遺。直到鄧小平主導改革開放，將軍隊改革納入其「四個現代化」之一後，現代化腳步得以再次大步向前。鄧小平在1978年復出後，將「人民戰爭」概念，檢討調整為「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1991年波灣戰爭後，乃強調將軍事準備重點置於「打贏一場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

註³⁸：非軍事指的是指純軍事之外的因素，也可稱之為準軍事因素或非戰鬥因素；二元性相結合包括奇與正、攻與防的結合；變化的原則反映的是靈活的時間方面，而流動的原則反映的是靈活性的太空方面；否定論就是運用否定性因素造成正面結果，極小原則是利用最小的投入獲得最大的產出。從狹義上說，否定論乃是適當地利用消極情緒剋敵制勝，極小原則就是以弱勝強，反對超出主要的戰略需要。林中斌，《核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9年2月），頁73～91。

註³⁹：翁明賢，〈預言第三波戰爭—評「核霸：透視跨世紀中共戰略武力」〉，http://www.sinorama.com.tw/ch/show_issue.php3?id=199978807110C.TXT&page=1/2005/5/16。

註⁴⁰：中共在革命鬥爭經驗中，形成野戰軍、地方軍和民兵「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

註⁴¹：莫大華，〈中共戰略文化初探〉《中國大陸研究》，第39卷5期，1996年5月，頁38、53。

④②」。1989年江澤民接任軍委主席，提出「科技強軍」作為共軍現代化建設新重點④③；1992年10月江澤民自「十四大」後，向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乃至於『信息化』戰爭戰略思維」轉變④④。

就中共軍事戰略發展層面而言，由於受到冷戰結束與兩次戰爭（波灣戰爭與科索沃戰爭）的影響，中共在國防政策和戰略理論兩方面分別在90年代末有重要轉變與確認：在國防政策方面，將共軍角色由傳統「守土戍邊」的先鋒，轉向作為維護「國家利益」的後盾，並不惜使用或威脅使用軍事武力確保「國家安全」與「國家主權」的維護，在戰略理論方面，堅持發揮後發優勢，勾勒出實踐軍事現代化之「跨越式」發展道路，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軍事變革」。特別在第二次波灣戰爭後，中共在戰爭思維轉變上已建立「正反面不對稱」與「非線性作戰」的作戰概念，其中不排除具備「先制攻擊」思維，以避免「後發制於人」的戰況發生，並逐步落實在作戰準則暨結合野戰用兵思想的具體作為中。

誠如，美國防部《2005年中共軍力報告》企圖以戰略文化的視角解讀中共軍事戰略思維：「中國領導人對如何將軍事實力達成實現國家戰略及目標的重要手段，在何種狀況下使用軍事手段或非軍事手段來解決問題，顯得並不明確；同時，中共對主權受到侵略或敵方挑起戰爭的界定，也顯得非常模糊。比如，當觸及諸如臺灣等國家核心利益問題時，將會發起先發制人打擊，但將此行動歸類為『戰略防禦』；須知中共軍事戰略充斥欺騙迷惑，如突然參加韓戰讓美國感到十分意外④⑤。」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更直言，中共正在轉變為區域強權，並有興趣對外擴張，但他現在還不知道中國究竟要向何處發展，並警告中國的高壓政治制度與現代經濟的需求之間難免會出現緊張。上述美方觀點證明中共戰略文化隱晦不明，詭譎莫測，而中外學者研究中國戰略文化熱潮的背景原因，實因中共逐漸由地區性大國向世界性大國邁進，中國的崛起與否會對世界和平構成威脅，世人希望從中國戰略文化傳統中尋找答案④⑥，故其未來發展深為世人所關切。

註④②：張萬年，〈當代世界軍事與中國國防〉《高技術戰爭與現代軍事哲學》（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0年4月），頁178～179。

註④③：陳梓龍，〈江澤民時期共軍現代化建設重點及影響評估〉《中共建政五十年》（臺北：正中書局，2002年10月），頁485～486。

註④④：李冀庸，〈本世紀軍事戰略與中國安全〉《中國評論》，第15期，1998年8月，頁34。

註④⑤：US DOD, 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DC: US DOD, 2005), p15.

註④⑥：同註⑤。

結語

目前中共戰略社群企圖將中共之戰略文化與中國博大精深的戰略文化傳統畫上等號，由2004年第6屆孫子兵法年會中，渠等大談戰略文化，就是明證。但是，中共自稱的戰略文化，其內涵在探討一種可以形塑的理論，不見得可以反映共軍內部的真實價值觀與戰略的本質所在，故其內部對共軍本身戰略文化的內涵探討甚少，甚至視為保密與禁忌之所在。換言之，中共的戰略文化絕不等於中國的戰略文化，兩者間存有戰略差異，中共對戰略文化的論述比較像是用來合理化某一政策的包裝（如反制中國威脅論），而非反映實際戰略行為，宣傳的成分大於實質。

探討中共與中國戰略文化差異何在，中共雖自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者，其戰略文化內涵雖然受到中國傳統戰略文化的影響，舉凡戰爭要師出有名、重防禦輕攻擊、愛好和平及強調慎戰與義戰等。但追溯中共戰略文化的內涵，其思想淵源，師承馬、恩、列、史、毛的理論基礎，深受共產主義影響殆無疑義；其歷史傳統，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強調唯物辯證法與階級鬥爭的暴力本質，實際上已與中國傳統的歷史文化脫鉤；中共雖稱防禦是其戰略文化的首要部分，但其對外戰爭重視謀略，採取奇襲手段，再以中共始終未放棄以武力犯臺為例，中共戰略文化仍充滿暴力與欺騙本質。

再者，由中共歷代領導人的戰略思

想中得知，其世界觀與戰爭觀深受對外戰爭經驗的影響。無可否認的，中共決策者體認世局的變遷，針對周邊環境進行戰略評估，繼而策定轉化敵我力量差異與優劣的指導原則，已形成其戰略文化的特質。其中，特別重視國家安全與領土主權的核心利益不容挑戰，實踐「跨越式」軍事現代化的發展道路，必要時運用不對稱作戰概念，不排除「先制攻擊」思維，以避免「後發制於人」的戰略構想，其軍事戰略思維的轉變，已勾勒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軍事變革」，詭譎莫測，深值世人警惕。

最後，共軍真正的戰略文化為何，各方觀點均無法精準的解讀；但「中國」戰略文化絕不等於「中共」戰略文化，純粹以中國戰略文化解讀中共戰略文化，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此外，我國與中共具有共同的中華歷史文化背景，實有利研究與洞察所謂「中共」與「中國」戰略文化的差異所在，不為中共目前對戰略文化研究之迷彩所述惑與誤導，期有效掌握中共戰略決策者的思維理則、戰略偏好、決策模式，以及解決爭端的傾向，深入瞭解中共對兩岸問題的觀點，研判其最大可能行動，及其對我國家安全之影響程度；進一步據以思考轉化兩岸間零和競賽的戰略分野，建立相關互信機制云云，不僅可預防戰爭，避免兵凶戰危，始可運籌帷幄，決勝於千里之外。

收件：94年10月21日

修正：94年12月18日

接受：94年12月21日